

中國應對G20

歐美經濟危機進一步暴露了全球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呼喚着構建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契機。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離不開參與全球治理和秩序重整的歷程。11月3日至4日，20國集團領導人第六次峰會（G20峰會）在法國康城（戛納）舉行。在歐美經濟低迷且歐債危機四伏之下，中國再次成為峰會焦點，被寄予厚望。中國政府智囊表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結構治理與經濟新秩序，首重與外部世界增強互信，攜手應對危機，以積極態度對待國際規則，增加話語權，為對應八國集團（G8），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應建立協調機制，表達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葛冲



□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在法國康城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第六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時，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左二）交談。

新華社



在G20峰會前，中國表達自身訴求，希望此次峰會確能確保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同時推動解決結構失衡與治理，構建全球經濟新秩序。對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見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全球正遭遇經濟結構不平衡、國際分工不平衡、國際貨幣體系不平衡等多重挑戰，全球經濟結構似乎「難以維持下去」，面臨調整與治理的需要。

保貿易開放 促儲幣多元

如今，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世界分工格局發生顯著變化，發達國家失業率高企，貧富差距擴大。儘管世界仍是一個以美元為主導的市場，但美歐經濟深陷危機，中

國等新興經濟體則不斷成長，對國際貨幣體系形成衝擊。

張宇燕指出，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除了確保領土完全、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與可持續增長外，離不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新秩序的重要環節。這至少包括三個目標：一是保障一個全球開放的貿易體系，二是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多元化，三是推動中國的價值與理念為世界所接受或至少成為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張宇燕認為，中國要在參與全球經濟結構治理與經濟新秩序中有所建樹，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加強與外部世界的互信，在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不景的大背景下，加強溝通，攜手應對危機。

善用G20平台 增加話語權

他稱，20國集團峰會並非一個具有約束力且各方高度一致的機制，只是提供了一個各方協調溝通的平台，隨着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可利用這一平台表達自身

訴求，並採取積極的態度對待國際規則，增加話語權。

張宇燕指出，當前保障一個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對中國至關重要。他說，現在美歐倡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實際上都是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但中國並不是規則的制定者，擁有規則制定權的國家或集團，都希望規則有利於擴大自身利益並限制對手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全力推進貿易自由化，在規則的制定上與各國進行溝通與協調。

避多敗俱傷 料終可協調

不過，張宇燕直言，國際規則早已存在，中國只是規則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而且「新規則的制定會很難，需要很長時間」，但他相信，「如果各方不希望多敗俱傷，最後還是可能找到妥協之道的。」

他還建議，對應八國集團，新興經濟體間應建立協調機制，這將有利於為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鼓與呼。但這也並非易事，新興經濟體情況各異，各自有不同的訴求。

中國2030年有能力引領世界



胡錦濤在此次G20會議前表示，繼續關注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要客觀認識和正確看待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作出的積極貢獻，照顧其合理關切，增加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國家「十二五」規劃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胡鞍鋼（見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未來20年「南北格局」將發生大逆轉，南北差距縮小，世界走向更加均衡。而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大發展的最大引擎、最大發展援助貢獻國和世界大變革的引領國。

新興市場輸出資本

胡鞍鋼認為，到2030年，「南方國家」將主導世界經濟格局、貿易格局和投資格局，結束了過去兩個世紀「北方國家」主導世界的局面。南北經濟比重由目前的「五五開」變為「七三開」；南北貿易格局由目前的「六四開」變為「七三開」；「南方國家」成為對外投資的主要接受方和輸出方。「南方國家」主要經濟指標佔世界比重與其人口比重趨同。世界走向更加均衡、更

加平等。

同時，全球經濟發展方式大變革，全球經濟結構、就業結構、能源結構大變革；全球迎來綠色能源革命；全球治理機制和結構大變革，「南方國家」成為主角，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更利於世界均衡發展。

中國的角色將舉足輕重。胡鞍鋼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大發展的最大引擎、最大發展援助貢獻國和世界大變革的引領國。

對外援助料佔GDP1%

「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具有越來越強的正外部性和積極的外溢效應，為世界作出越來越大的市場貢獻、貿易貢獻、就業貢獻、投資貢獻。」胡鞍鋼說。

另外，胡鞍鋼認為，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南南」國際合作、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積極推動全球範圍內的「南北」公平發展、平衡發展。未來還可制定中國新的對外援助計劃「三步走」：中國對外援助佔GDP的比例第一步在2015

年達到0.3%；第二步在2020年提高到0.5%；第三步在2030年提高至1%或以上。

胡鞍鋼還強調，中國將成為世界大變革的引領國。「中國要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積極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政治秩序。中國要在保護地球環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節能減排、促進綠色工業革命方面做出積極的貢獻。」



■專家預計，2030年中國將引領世界變革。圖為上海浦東。

資料圖片

各國幣值料重新洗牌



■各國貨幣之間相對估值的大調整，從而引發貨幣危機。圖為歐元標誌。

資料圖片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見圖）近日撰文稱，動盪的國際環境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給中國經濟帶來挑戰，但在動盪中也蘊藏着可以讓中國經濟不斷崛起的重大戰略機遇。他認為，美國和歐洲目前均面臨二元經濟結構的嚴重挑戰，美國經濟復甦的道路比歐洲更艱難，「歐美改革步伐不一致，外加新興市場經濟被投資者屢屢看高，將帶來一輪各國貨幣之間相對估值的大調整，從而引發貨幣危機。」

李稻葵預測，未來四、五年美國的基本狀況，將可能是維持比較低速的經濟增長，財政狀況繼續惡化，政治紛爭不斷出現。在這環境中，美國唯一的

政策選擇就是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此帶動和刺激經濟的發展。因此，第三輪量化寬鬆（QE3）不管以什麼名稱出現，可能都是遲早的事情。

QE3無可避免 美元勢現危機

李稻葵分析，未來3年之內會出現這樣的情形：歐洲的債務狀況得到穩定，金融市場得到恢復，而美國仍在動盪之中。這時金融市場將開始擔憂美元的信用，資本會從美國流向歐洲，導致美元兌歐元匯率出現大幅波動，美元危機將會出現，類似於1971年8月前的情形。

面對這樣一個動盪的國際經濟形勢，李稻葵認為，中國必須從三個方面做好認真的準備：第一，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第二，必須管理好自己的外匯儲備；第三，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本次G20峰會再次聚焦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全球治理等重要議題。國家發改委宏觀院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見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反映出三大缺陷（見表），如果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結構改革方向及路徑不能

夠達成一致的話，全球系統性風險、經濟失衡、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等重大問題就不可能有效解決。從歷史經驗看，如全球治理問題不能得到很好解決，經濟全球化進程最終會被世界性大危機或世界性大戰所中斷。「最終受害的是國際社會自身，尤其是發展基礎十分脆弱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

在經歷過這一輪國際經濟危機後，張燕生認為，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將發生深刻的變化，都將出現階段性轉捩點。開放的世界經濟格局不會改變，但全球系統性風險會上升。

消除系統性風險 儲備貨幣宜均衡

張燕生指出，經過危機後，大家都明白，在全球治理結構、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中，要想不遭受系統性的風險，就必須要讓世界貨幣體系一步一步地朝穩定的、均衡的貨幣格局演變。

「但這過程將很漫長，或許需要60年甚至更長。」張燕生認為，未來如果歐元能夠再存在60年，那麼歐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所佔的比重可能將從25%上升到35%；如果人民幣能夠再使用60年，人民幣在全球儲備貨幣中會佔到15%的比重。屆時歐元和人民幣加起來，所佔比重就可能達到50%，再加上佔總比重10%的黃金和瑞士法郎，那就達到60%，而美元就只佔40%。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投資者、每一個貿易者、每一個生產者在選擇資產的時候就可以在美元、歐元、人民幣和其他的貨幣中間有一個對沖風險的選擇。

對於中國，張燕生認為，下一步的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提升資本國際化程度，大力促進金融創新和金融深化，培訓農民工和提高人力資本增值，都是一些最重要的發展課題。為此，開放競爭、完善市場、加強監管、重視人才，是發展潛力進一步改善的重要方面。

全球經濟結構三大缺陷

- 1.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缺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權按份額所佔比例來確定，份額由基本投票權和GDP、貿易權重來確定，主要議題需要85%以上投票權方可通過，美國可一票否決。
- 2.世界貿易體系的制度缺失。世貿組織（WTO）遵循的是一國一票、一致通過的原則，來推動並完成每一輪的貿易談判。一些大國為了本國政治選舉的需要而對國際社會說不，導致那些涉及全球共同利益和窮國及弱勢群體利益的進步只能被迫中斷。
- 3.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機制缺失。全球化使世界越來越像一個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卻缺少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結構和宏觀協調機制。這就必然導致經濟霸權主義、貿易利己主義和投資機會主義四處橫行。

國際分工失衡 窒礙經濟增長

解決世界經濟失衡是G20峰會的重要議題。國家發改委宏觀院對外經濟所所長張燕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失衡」，是各國不同比較優勢下國際分工的不平衡。而全球貨幣結構也越來越不能反映全球的經濟結構，失去貨幣錨的世界經濟正面臨着經濟增長、通脹、就業和匯率相互背離困境的挑戰。

全球經濟失衡表現為全球經常項目失衡，而本質是國際分工體系中金融分工與貿易分工的失衡。自2003年開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順差快速增長，同時，發達國家出現大幅逆差。逆差主要在美國，大約8,000億美元；順差則主要在中國、中東、德國、日本四個經濟體。

從全球經濟分工格局看，製造業中心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體系比較脆弱，在對外貿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進行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風險將越來越多地由新興市場國家承擔。